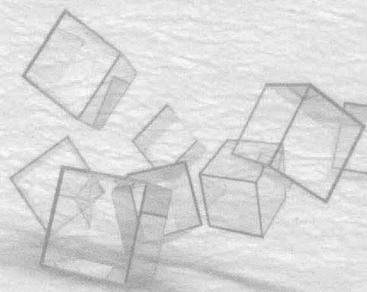


外国语言文学书系 ● 青年学者文库

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 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

HUAYU LILUN DE ZHISHI PUXI JIQI ZAI ZHONGGUO DE LIUBIAN YU CHONGGOU

袁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CCNU2010DG009)

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 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

袁 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袁英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22-6106-3

I. ①话… II. ①袁… III. ①话语语言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715 号

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

© 袁 英 著

责任编辑:陈 风 刘晓嘉

责任校对:易 雯

封面设计:甘 英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16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2.25

版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袁英是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也是我的学生。袁英很文静，为人谦和，做事仔细，在我的学生中，她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写出来的文章却思维清晰，语言简练，大有“不让须眉”的气势，这也正是我格外器重她的原因。前几天她告诉我，博士论文准备出版，我虽然因其突然而心中有一丝憾意，但既然袁英这样做了，我尊重她的选择。

对概念或术语的正本清源遂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鉴此我于2007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文学批评”，袁英作为课题组成员，其任务就是对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话语（discourse）作溯源和流变研究。《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这本书既是袁英的博士学位论文，而其中的有些部分又是我主持的这个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袁英写作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梳理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的发展演变历程，考察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流变与重构，进而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反思。

这本书有它自身的特点。袁英对“话语”的考察不是仅仅确立“话语是什么”，而是追问“话语如何”，通过考察众多关于话语的异质论述来为“话语”空间定位。如书中列出的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本维尼斯特关于语言与话语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尔都塞、佩肖关于话语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看法，特别是福柯的话语与知识、权力的关系以及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对话语理论的新的探索和发展，这些不尽相同的理论表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五彩





缤纷的话语世界。在强调话语理论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同时，袁英又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勾勒出话语理论发展史中的主要线索和内在理路，揭示作为知识体系的话语理论产生和建构的动态历程，体现出清晰的历史意识。袁英在书中还以其细腻的思辨力对各种话语理论做了深入辨析，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她对福柯话语理论中关于话语生产，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等问题的分析就很有见地。本书在研究话语理论的中国传播和流变时，也不是仅仅沿寻话语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挪用和改造的轨迹，而是将其置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语境之下，探讨其语境对中西话语理论交融的影响和规约。这些特色和优势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读袁英的文字有一种愉悦感，她的文笔于细腻之处透出机敏和思辨。眼下高校青年教师压力很大，如何为我们的青年教师提供更合宜的学术环境，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是需要大家一起思考的问题。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不懈怠，不放弃，袁英将来一定会有更好的著述问世！

胡亚敏于华大家园
2013年5月27日



前 言

本书以 20 世纪西方话语理论为研究对象，旨在梳理和探讨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经由跨语际旅行来到中国后的流变与重构历程，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观照和反思。本书力求实现三个研究目标：一是全面考察 20 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的发展演变历程；二是辨析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流变与重构；三是探讨话语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从知识谱系学的研究视角入手，本研究注重对作为知识体系的话语理论的产生和建构的动态历史的描述，在强调话语理论的多元性和异质性的同时，也力图勾勒出贯穿在话语理论发展史中的主要线索和内在理路。

除绪论和结语外，全书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围绕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以及话语与意识形态理论两个中心论题展开论述。索绪尔关于语言/言语的划分，为话语理论的萌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语境下，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从语言转向话语的早期理论规划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研究中发现了超越语言和言语的第三层面，即话语层面，并对作为话语的神话的构成单位进行分析，“话语语言学”的构想在他这里初露端倪。本维尼斯特看到了结构语言学存在的局限，通过关于话语世界的描述、对历史陈述和话语的区分以及对话语主体性问题的探讨，策动了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在对话语与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中，阿尔都塞和佩肖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理论对法国话语分析学



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性质、意识形态与主体问题以及有关意识形态话语的讨论，为话语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和思考线索。佩肖则在吸收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新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理论。

第二章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重点考察对象，试图把握和理解福柯视野中的话语思想的整体面貌。首先，福柯关注的重心从语言转向话语，陈述和话语形成是其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的特性具体表现为话语事件、话语实践和话语的实证性。话语的生产受到排斥程序、内部控制原则和针对说话主体的控制原则的限制。其次，话语、权力与知识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动态复杂的关系网络。通过对话语与权力的互动、权力/知识的共生体以及话语与知识的关联这三个层面的分析，福柯对话语问题的重新思考和阐述得以清晰地呈现。另外，福柯从三个方面解释了意识形态概念难以运用的原因：意识形态与真理之间的对立；意识形态必然和主体相关涉；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因此福柯摒弃了意识形态概念。最后，福柯认为从作者在话语中的一般功能出发，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并进而在话语领域内对“作者一功能”的四个特征做出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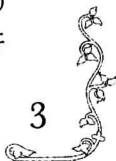
第三章探讨了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研究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吸收、挪用和改造。女性主义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与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政治诉求紧密相连，在挪用“话语”概念的同时也对其加以改造。女性主义学者对权力/知识问题的关注与她们在当下知识体系中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福柯的权力/知识观促使女性主义学者摆脱的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并对父权制中许多“知识真理”提出质疑。女性主义学者在评价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时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和批评，另一些学者则充分肯定福柯的权力/抵抗观对女性主义的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有效的抵抗策略或途径做了有益的探讨。后殖民研究同样从福柯的话语理论中获益良多，萨义德通过运用福柯的话语概念以及权



力/知识理论对东方主义批评进行了重新定位，赋予其东方学研究不同于此前殖民主义批评的全新视角和批判力度。同时，他与福柯之间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矛盾、分歧和偏离。针对关于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的争议和批判，罗伯特·扬认为有必要重新考察萨义德阐释、运用话语概念的方法，他提出应该回到福柯对话语概念的源初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殖民话语”重新理论化。

第四章梳理了话语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流变。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中的传播始于学界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的翻译与评介。20世纪80年代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研究大多以译介和评述的形式呈现，且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90年代以后，对话语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关于重新语境化后“discourse”术语翻译问题的讨论；对作为关键词的“话语”概念的厘清和辨析；话语范式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运用。在对话语理论的接受过程中，异域和本土、彼时与当下的语境和时空的错位，使学界在取得了一些批评实绩的同时也表现出若干问题：首先，在中国文化现实的影响下，学界对话语理论的吸纳和接受视野相对单一化和同质化；其次，话语理论的引入更新了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观念，学界从话语视角切入对文学的本质属性做出重新界定，话语分析为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最后，学界展开对话语理论本土化的反思，发掘和清理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话语思想，并提出建构中国话语研究范式的设想，以期实现话语研究的多元对话。

第五章阐发了话语理论之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借鉴和反思意义。本书认为话语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入思路径。在话语理论的观照下，文学批评被视为一种生产性的话语实践，实践性和生产性成为批评话语的内在品格，文学批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要考察“文学批评”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又要辨析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批评的争议和诘责，本书运用话语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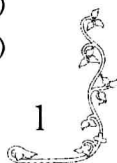




的方法重新审视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场，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文化语境、学术背景与文学观念、当代文学制度、批评话语的生产方式与批评主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的变化，和这些变化如何影响、规约甚至决定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现实生态。在对当代文学批评生态的审理和探究的基础上，本书针对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从批评家的文化认同和话语立场、批评家的知识更新和理论创新以及文学批评中的价值判断和责任伦理等方面，对全球化时代批评主体的话语策略作了新的探讨和反思。此外，批评话语的实践性使其总是向现实问题敞开，当代文学批评家应该始终保持对批评对象的一种“距离观照”，保持对文学和文化的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从而走上真正的“批评之路”。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2)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9)
三、研究方法：知识谱系学	(15)
第一章 语言、话语与意识形态	(19)
第一节 从语言到话语的转向	(19)
一、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索绪尔的语言观	(20)
二、超越语言和言语的第三层：列维—斯特劳斯论神话	(23)
三、转向话语：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理论	(27)
第二节 话语与意识形态	(33)
一、从意识形态到话语：阿尔都塞的话语观	(34)
二、语言、话语与意识形态：佩肖的话语理论	(41)
第二章 福柯的话语理论	(46)
第一节 对“话语”的重新界定	(46)
一、核心概念：陈述与话语形成	(47)
二、话语的特性：事件、实践、实证性	(52)
三、话语的生产与控制	(56)
第二节 话语、权力与知识	(59)
一、话语与权力的交织	(60)
二、权力/知识的共生体	(63)
三、话语与知识的关联	(69)





第三节 福柯论话语与意识形态	(73)
一、真理、意识形态与话语	(74)
二、主体、意识形态与话语	(75)
三、话语、意识形态与权力	(77)
第四节 作为话语功能的作者	(81)
第三章 话语理论与性别、后殖民研究	(86)
第一节 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	(87)
一、女性主义对“话语”概念的挪用与改造	(87)
二、权力/知识视域下的女性主义	(92)
三、对权力的抵抗如何可能	(97)
第二节 话语理论与后殖民研究	(102)
一、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	(103)
二、萨义德与福柯：分歧与偏离	(107)
三、回到话语理论：“福柯模式的殖民话语”	(112)
第四章 话语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和流变	(116)
第一节 话语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116)
一、重新语境化下“discourse”的翻译	(119)
二、对“话语”概念的梳理和反思	(123)
三、话语范式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中的运用	(127)
第二节 话语理论在中国的流变	(131)
一、话语理论在中国文化现实语境下的选择性接受	(131)
二、话语分析：中国文论和批评的新视界	(138)
三、发掘传统文论话语思想与建构中国话语研究范式	(143)
第五章 启示与反思：话语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147)
第一节 作为话语实践的文学批评	(148)
第二节 话语分析：重新审视当代文学批评场	(154)
第三节 批评主体的话语策略：批评家何为	(161)
结 语	(167)
参考文献	(171)
后记	(185)



绪 论

“话语”(discourse)最初作为语言学里的一个术语,其核心指涉是“语言在使用中”(language in use)^①,随着语言学领域研究视域的拓展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知识理论建构观念的转变,“话语”日益溢出其源初的学科边界,延伸至文学批评、人类学、精神分析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文化、性别以及后殖民研究等诸多学科。时至今日,这一术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地位已然成为学界的共识。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言,“对意义的关注热点转向了不同的方面,人们更关心的不是‘语言’运作方式的细节,而是话语在文化中的更广泛的作用……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来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②。然而,与其备受关注的地位相悖的是,“话语”在各学科语境中的含义仍然含混不清,在文学和文化理论中它具有比其他任何术语更为广泛的语义内涵,但在众多理论文本中对它所做的界定却最少,似乎它已经是不言自明的概念、显而易见的常识,只需要作为分析和批评的“武器”发挥其效用,而不必追问它的前世今

① 出自“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is necessarily,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use.”参见 G. Brown, G.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

② [英]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页。此外,在《话语理论与实践读本》一书导言中著者也提到“社会科学中的非常显著的‘转向话语’”(“the very evident ‘turn to discourse’ found across the social sciences”)。参见 M. Wetherell, S. Taylor and S. J.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 3.





生。于是，问题来到了我们面前，“话语”源自何处？有何功能和效用？又向何处流动和旅行？旅途中是否因为不同的时空境域而产生了意义的变迁或增殖？作为“对普遍意见的平坦前沿的突破”，这些问题“压向我们，以致我们不再能避免它或坚持我们习惯的意见”^①。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追索和探究构成了本书写作的起点，对这个在频繁使用中已经被充分自然化（naturalized）的术语提出质疑，将人们所熟悉的“话语”重新“陌生化”与“问题化”，使其重新回到历史中。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论述之前，先将研究对象作一界定。从词源上考察，现代英语中的“discourse”一词是由拉丁语“discursus”、古法语“discours”以及中古英语“discours”（也以“discors”形式出现）逐步演变而来。拉丁语的“discursus”派生于其动词形式“discurrere”，指“前后或往返运动”、“东跑西颠的动作”或“来回忙碌”。这一含义随着语言的衍变沉积在英语的“discourse”一词中，可以说，话语这个词“具有‘环形性’以及‘前后移动’等，这个术语的印欧词根（kers）及其拉丁形式（dis-，“以不同方向”，+currere，“跑”）所暗示的一切内涵”^②。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ED, 2nd Edition）中的释义，“discourse”最早出现于14世纪晚期，意思是“推理”、“推理的过程或能力”。16世纪以来，

① [德]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471页。

② [美]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另参见[法] 罗兰·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武佩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discourse”往往用于指涉“言谈”、“讲话”、“谈话”、“交谈”，后来更多地用于描述正式的讲话或叙述，或“就一话题展开的具有一定长度的口头或书面讨论”，也常常与“论文”、“著作”、“训诫”、“布道”等联系在一起。18世纪“discourse”逐渐成为一个专门术语，与散文、哲学论文之间的界限难以分清，“如埃德蒙·伯克等人针对‘优美’和‘雄浑’所提出的相关艺术评论，都是用discourse这类的词来作为文章的标题”^①。20世纪后半期以来“discourse”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研究对象，在“话语分析”中，指构成其分析单位的“比句子要长的语篇或语段”（texts or utterances longer than one sentence）。作为语言学术语，“discourse”既包含了原先主要用“utterance”（译为语段）所指代的口头语言，也涵盖了“text”（译为语篇、篇章或文本）所指代的书面语言^②。

尽管法语的“discours”与英语的“discourse”在词源上有着密切联系，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等关系。在法语中，“discours”常见于各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或文学的语境，其意义十分散漫，近似于“‘聊天’、‘闲聊’、‘自由交谈’、‘即席谈话’、‘陈述’、‘叙述’、‘高谈阔论’”等^③。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普通语言学》（1966）中区分两种故事讲述方式时赋予“discours”以特殊的含义，即它是一种相对于纯然客观的历史叙述（histoire）而言的“在时间上与讲述行为相关的事件”^④。德语中与“discourse”相对应的词是“diskurs”，它具有

① 廖炳慧：《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② 参见 Wendell V. Harris.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p. 66-67.

③ [德] 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见陈永国译，汪民安、马海良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④ Tony Bennett and Meaghan Morris. eds.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2005, p. 92.



两层含义，一是源于对英美语言研究成果的吸收，用来泛指对篇章的各种理解；二是在哲学领域里特指“一种为寻求真理而进行的哲学讨论”，话语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普遍语用学中的关键概念，在他看来，为寻求真理而进行的讨论旨在“对标准的适用要求取得一致意见，或对日常交际行为中一些不成问题的命题的真值达成一致”^①。“discourse”在俄语中的近似对等词“slovo”与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语言哲学研究密切相关，它既可以指代一个单独的词，也可以代表一种权威的用词方法。托多罗夫指出巴赫金对这一术语的解释不尽相同，如话语有时是“具体的整体的语言”，有时是“作为具体的整体现象的语言”，有时又相当于“表述”^②。事实上，巴赫金并没有对“话语”、“表述”、“言语”做出严格的区分，而往往是在同一意义上交替使用这些术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话语”这一术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频繁出场，被广泛用于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历史、社会学等各个学科，日渐成为对语言的本质和使用展开不同研究的交汇点。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话语”是一个几乎无法界定的概念，因为它关涉来自各种理论和学科立场的众多彼此间相互冲突和重叠的定义，即使是在同一学科语境下，这一术语的指涉也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这个术语的语义场如此不准确以至于它的任何使用注定是不清晰的”^③。不同学科语境下的理论家们出于各自特定的问题域和研究目的，必然会对“话语”做出不同的阐释和辨析。

语言学家试图通过比较话语与语篇(text)之间的异同来界定话语。杰弗里·利奇(Geoffrey Leech)和迈克尔·肖特(Michael

① [德] 哈杜默德·布斯曼：《语言学词典》，陈慧瑛、温仁百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1~112页。

② 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87-88.

③ [德] 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陈永国译，汪民安等编：《福柯的面孔》，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Short) 认为, 话语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语言交流, 作为一种人际交流活动, 其社会目的决定交流的形式; 而作为口头或书面的语言交流, 语篇则被视为一种以听觉或视觉媒介编码的信息, 这意味着对语言交流所处语境的忽略。迈克尔·斯塔布斯 (Michael Stubbs) 指出话语和语篇这两个术语的用法往往难以辨别, 两者的含义大体相同, 但在许多地方又有不同的指涉, 如话语是口头的、交流性的, 具有一定的长度和深层连贯, 而语篇则是书面的、非交流性的, 可长可短, 并具有表层衔接^①。而话语分析则倾向于将话语和文本 (text) 区分开来, 作为连贯的叙述整体, 文本是除去了生成条件之外的“经验论的对象”, 相比之下, 话语才是话语分析这一学科的认识对象, 它指的是所有与其产生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历史条件相关的文本整体。在话语分析中只有从文本分析出发才能使话语的理论化成为可能, 同时话语和文本这两个概念本身应该具有多元化的指涉^②。

在叙事学理论中, 热奈特认为从术语角度来看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故事/情节的区分并不恰当, 而他的故事、话语和叙述三分法则更能反映叙述现象的全貌, 其中故事/话语间的区别虽然接近于故事/情节的划分, 但却比后一组词更具透明性和说服力。此外, 热奈特关于故事/话语间的对立并不同于本维尼斯特此前提出的对于两种故事讲述方式的区分, 在《叙述的边界》(1966) 一文中, 他通过对三组二元对立命题的思考来探讨叙述的理论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话语与叙述间的对立, 它往往用来区分“我们清楚谁在讲话的讲述”和“一种‘无人言说’的纯然的讲述”。热奈特试图消解这个二元对立, 在他看来, 叙述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 具有主观色彩的不纯的叙述总是存在着, “一条叙述不论看起来是多么透明和不隔, 一个判断头脑的符号

① See Jeremy Hawthorn.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3, p. 353.

② 参见 [法] 乔治-埃利亚·萨尔法蒂: 《话语分析基础知识》, 曲辰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10 页。



是极少缺失的”^①，因为“话语”的成分总是可以通过叙述者的声音、人物—叙述者的声音或采用书信体话语进入。

在探讨语言哲学问题时，保罗·利科提出话语就是“语言现象”或“语言的运用”，与语言学家所关注的语言系统或语言规范相对应。通过话语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比较，利科总结出话语具有的四个特性：首先，语言系统处于时间之外，而话语的实现则立足于瞬时和当下；其次，在语言中主体是缺席的，而话语则是由说话者通过一套复杂的指示系统展开；再次，语言中缺乏一个语境，语言符号只与同一系统内的其他符号相互关联，而作为事件的话语则总是涉及它要描述或表达的语境；最后，语言只能为交流提供符号条件，只有在话语中才能实现信息互换，因此话语不仅要有一个语境，还要有另一方，一个与说话者面对面的对话者。这些特性共同构成了作为事件的话语，利科在强调话语的事件特征的同时也引入事件和意义间的辩证法，在他看来，“正是在话语语言学中事件和意义相关联，这种关联是全部解释学问题的核心。正如语言是在话语中实现、作为体系超越自身并作为事件实现自身一样，话语也是通过进入理解过程，作为实践超越自身并变成意义”^②。

在历史学领域，罗兰·巴尔特较早从话语角度系统地阐发其后现代主义的史学观。在1967年发表的《历史的话语》^③一文中，

① [英] 拉曼·赛尔登等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9页。也参见 Genard Genette, “Boundaries of Narrative”,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6, 8 (1): pp. 8-13.

② [法] 保罗·利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137页。

③ 巴尔特一般被认为是符号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而其《历史的话语》一文标志着他迈出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第一步，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历史话语的分析并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而是历史哲学性的。该文虽然在1970年就已经译为英语，但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出现在历史哲学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其影响往往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426页。

